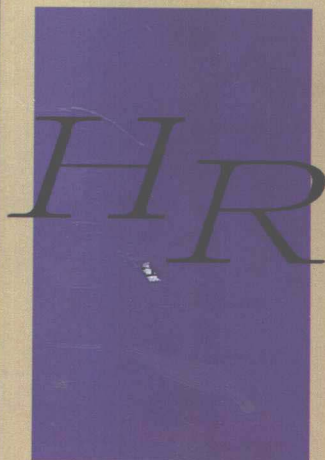


本书由福特基金会、
欧洲科学基金会资助出版

全球华人商贸联系的 比较研究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 编
北欧亚洲研究所



经济科学出版社

本书由福特基金会、欧洲科学基金会资助出版

全球华人商贸联系比较研究 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欧亚洲研究所 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华人商贸联系的比较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欧
亚洲研究所编. —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ISBN 7-5058-1353-6

I. 全… II. ①中… ②北… III. 华侨-商业网-对比研究-
文集 IV. F71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0527 号

责任编辑: 李 菁

责任校对: 杨晓莹

封面设计: 苗 苗

版式设计: 代小卫

技术编辑: 潘泽新

全球华人商贸联系的比较研究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欧亚洲研究所 编

*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出版社电话: 6211886 发行部电话: 62568479

经济科学出版社暨发行部地址: 北京海淀区万泉河路 66 号

邮编: 100086

*

850×1168 毫米 32 开 5.25 印张 130000 字

1998 年 2 月第一版 1998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1-500 册

ISBN 7-5058-1353-6/F·959 定价: 9.20 元

前 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欧亚洲研究所共同发起和主办的、并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和欧洲科学基金会赞助的“全球华人商贸联系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于1996年9月10日~12日在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召开。海内外专家、学者及观察员共60余人出席了会议。

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姜汉章局长的主持下开幕，王洛林副院长致开幕词。他首先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诚挚的祝贺，并向与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他指出：当今，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日益密切，特别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成功，海内外不少有识之士越来越重视对与华人相关问题的研究。在这种形式下，在北京首次召开以全球华人商贸联系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意义重大。他衷心祝愿会议圆满成功。继王洛林副院长讲话之后，主办单位之一的北欧亚洲研究所所长汤米·斯文森先生作了发言。他在向福特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表示感谢时，从科学的出发点、研究的问题和科学的目标三方面解释了筹办这次会议的初衷。最后希望通过广泛的讨论，揭开华人经济成功发展之迷。福特基金会驻京首席代表托尼·赛奇先生也在开幕式上讲话，并预祝会议成功。

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共有三个，即（1）华人企业界的内部结构与运营；（2）华人企业界与所在社会的关系；（3）华人企业界聚散的因素与条件。学者们围绕着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入、热

烈而友好的讨论，对一些问题取得了共识，而且对更多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意见交流，并对今后有关全球华人商贸联系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研讨会于12日顺利闭幕。在闭幕仪式上，许多与会者争相发言，畅谈研讨会的成功，他们对研讨会的主持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欧亚洲研究所，以及福特基金会及欧洲科学基金会表示深切的谢意。学者们相约在不远的将来再次聚会，共同讨论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本论文集是根据研讨会上由与会者提供的论文中挑选出来的，同时也将研讨会纪要一并刊出，以便概要地反映出研讨会的全貌。由于研讨会上分发的境外代表的论文是内容摘要，因此这次汇编成册时，重新将入选论文全文译出（仅对个别论文作了少量的删节），全部译文由徐更生研究员校对、定稿。

我们再一次感谢美国福特基金会对出版本书的资助，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编 者

1997年9月

目 录

“全球华人商贸联系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会议

纪要·····	(1)
东南亚华人网络——过去、现在与未来·····	(9)
东南亚沿海国家的政治结构与华人商业联系：	
历史的回顾·····	(26)
华人企业家与当代东南亚经济发展·····	(41)
华人企业家：家庭与奉献·····	(49)
交易成本、文化价值和华人商业网络——综合研究·····	(59)
华人企业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与企业运行实绩	
关系之比较·····	(84)
马来西亚的华人商贸网络及马来政治庇护·····	(93)
信用及其局限性：华人货币文化面面观·····	(120)
附录 1：世界各地的华人跨国公司一览·····	(143)
附录 2：“全球华人商贸联系比较研究”国际	
研讨会与会者名单·····	(152)

“全球华人商贸联系的比较研究” 国际研讨会会议纪要

1996年9月10日~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召开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欧亚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以全球华人的商贸联系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研讨会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和欧洲科学基金会的赞助与支持。海内外专家、学者及观察员60余人出席了会议。

研讨会的主题包括：（1）华人企业界的内部结构与运营；（2）华人企业界与所在社会的关系；（3）华人企业界聚散的因素与条件。在为期三天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围绕主题各自陈述观点，相互切磋，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将有关华人商贸联系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首先，对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共识。例如：（1）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中国经济改革不断取得进展的今天，认真研究全球华人经济、华人商贸联系等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2）在华人经济蓬勃发展、华商企业不断扩大的过程中，“网络”、“关系”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3）华人商贸企业在侨居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但不可过于夸大；（4）探讨全球华人商贸联系、不能脱离中华传统文化这一背景；（5）华人经济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华人商贸联系只是其众多内容之一。因此，弄清与华人经济、华人商贸联系相关的一些概念是极其重要的。例如，目前世界各国的华人建立了许多跨国公司，它们的经营活动越来越超越其所在国

的国界，在世界各地都拥有子公司。“华人企业家”——具有中国血统、但加入当地国籍并融入当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的企业家，实际上是由老一代华侨企业家演变而来的。

其次，由于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所以大家在对一些问题取得共识的同时，还对一些问题发表了见仁见智的见解，如对华人经济行为中经常遇到的“网络”、“关系”、“信任”等词汇在华人经济行为中的确切含义、总体功能及特征；华人商贸网络与所在国的社会、政治关系；东南亚华人在各国以至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其中引起与会代表广泛兴趣和关注、同时又颇有争议的主要集中在下述一些问题上：

1. 如何看待全球华人商贸联系发展中的“网络”、“关系”。

首先，关于“网络”、“关系”等的概念，与会代表各有各的界定。来自法国的学者弗·吉布卢先生认为：“网络”一词应用范围极广，但却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粗略地说，它可以定义为以某些形式连接起来的各个部分的总和，它是由行为方（个人或组织）之间的关系组成的。这种关系或联系包括内容（信息流、资源流、一般性社会关系）和形式（联系强度）。理论上讲，网络可以被看成是组织和市场的相互渗透。从经验上讲，它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组织。实践中，网络需要4个要素：（1）行为方（即操作者）；（2）活动，即这种组织模式的最后行为；（3）资源；（4）约束机制。瑞典的M·布瑞尔先生则认为，“网络”就是持续发展的个人关系。华商似乎要花费很多时间来开发和保持各种各样的个人关系网，华商的这种网络战略实际上可以解释为，在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中做一些可预见性的努力，同时又可以克服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阻碍因素。英国的吴卫平先生指出，“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双向联系，而关系网则超出了这个层次，它是指双方之间的交易网络。也就是说，“网络”是由各种关系网组成的，同时，它也是一种结构、组织，有其自己的规则。由于网络规则

与中华文化价值是彼此重叠的，所以华人商业网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并由中华文化价值和传统维系着。简言之，华人商业网络是一种“动力组织”，这种动力产生于网络规则与中华文化价值的重叠。来自美国的钟伟强和加里·汉密尔顿认为华人商业网络可以被理解为，使家族商业扩张的机构，乡亲关系是华人商业网络的组织原则。澳大利亚的戴维·沙克先生认为“网络”就是关系网。西方人也讲关系网，但不同于华人的关系网，后者是以个人关系、个人经历等为基础，在同乡、同事、战友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而在中国学者丘立本先生看来，“网络”即华人为互救自助，以地缘、血缘、业缘为基础而形成的组织，如帮、会馆、同乡会、中华商会等。

尽管与会者对“网络”这一概念界定的角度各不相同，但从上述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网络”不外乎就是一种关系，或是一种机构、组织。华人商贸网络受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比较大。

学者们除了对网络的概念进行了不同的描述，还对其特性、功能、种类等发表了各自不同的看法。例如在谈到网络的特性时，中国学者指出，与中国向海外移民的历史、性质等因素有关，海外华人网络不但具有被动性、自发性和自卫性的特点，而且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特别是对英、美、日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网络具有从属性的弱点。后者应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另外，由于华人网络是建立在以地缘、血缘为纽带并依靠传统文化来维系的人际关系上，所以一方面它表现出确定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不确定性。瑞典学者则认为，关系网不仅是经济行为中人们彼此互换资源的有效渠道，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人们联合的纽带。所以，网络具有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特性。

在谈到网络的功能时，法国学者指出：网络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它是理解公司间或公司内相互关系的分析工

具；(2) 它是行为方之间的管理模式。瑞典的学者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网络是一种实现特殊经济目标的工具。而中国学者则认为，网络是动态的、持续发展的，所以网络的功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特别是在探讨华人商业网络功能时，更应注意到这一点。他接着指出，根据历史的考察，结合现状可以看出，海外华人网络的主要功能，在殖民地时期表现为发挥华人企业“中间商”的作用；在东南亚各国取得独立后，则主要表现为发挥华人企业的“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发展民族经济”的作用。

关于华人网络的种类。美国学者在探讨 20 世纪 40 年代香港华人家族厂商网络、商业网络的特征时，将网络分为三种形式，即以连锁董事（即指一个人在一家以上厂商的董事会中任职）的形式创建的厂商网络、地区性网络和每个有限公司的股东网络。中国学者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将华人网络分为，过去存在但现在意义不大的网络，以及现正在起作用的网络和将来可能成为网络的“潜在网络”三种类型。

关于网络的作用。英国学者认为经济活动中的网络可以给各方带来好处，表现在（1）降低交易成本；（2）创造一个新的市场；（3）产生规模效益。网络不仅能够产生效率，而且确实是有效的。它可以使现存市场内在化，也可以创造出一个本不存在的市场。瑞典的学者指出，网络的作用在于使行为方（1）获得原料、劳动力、新技术和贷款；（2）获得商业执照和其他法律认可；（3）寻找合适的商业伙伴、市场销路，分配渠道等。

2. 如何看待中华文化价值观、历史传统与华商获取成功的关系。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探讨华人经济、华人商贸获取成功的原因等问题，仅仅从其经济行为本身、经济政治的相互关系、同所在国的关系等方面着手研究是不充分的，必须要考虑到中华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与华商成功的关系，才能做到全方位地把握。但

是，中华文化价值观、历史传统与华人经济事业的成功这三者之间到底是怎样一个关系呢？对此，代表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一位中国学者指出：从全球范围看，我们在考察华人经济成功和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历史传统的时候，可以发现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企业、一个人，它的经济发展和振兴的背后，总有一种作为动力和规范性的文化力因素——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在起着推动和导向的作用，这种文化力因素的核心，就是该国、该民族、该企业在它的母文化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伦理精神。虽然海外华人经济事业的发展过程，要受到来自当地、侨居国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的影响，但却被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背景和传统价值观念的烙印。传统的儒学理论使华商形成了一个跨国家、跨文化、跨行业的华商经济圈、华商网络、儒学精神，“勤”、“诚”、“公”、“俭”的价值取向，以及道、佛的世俗化的观念等极大地促进了海外华商事业的成功。有的海外学者对此也表示了相似的看法。如来自荷兰的学者在其发言中指出，80年代华商企业在东亚与东南亚的成功，显然得益于有中华文化传统的家族组织的重要影响。来自英国的学者认为，网络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一种动力组织，其规则受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决定。来自比利时的学者以台湾、法国和比利时的华人社会为例，分析了“会”与华人经济事业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会”深深根植于中华历史传统及其文化之中，各地华人社团均继承了这一共同的遗产。在海外的华人社区中，“会”的功能、特别是其经济功能也像在台湾一样，对华人事业的成功和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瑞典学者利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东南亚沿海国家的政治结构与华人商业联系，指出华商获得巨大成功的力量，一方面归因于东南亚的特殊历史环境，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则归因于中华文化和历史传统，从中华文化中寻求解释华人取得巨大经济成功的原因，似乎是最合情理的。

但有些学者对此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来自新加坡的学

者在其提交的论文中指出，新加坡的华人同新加坡人有不同之处，如华人商贸往来中的口头承诺是常见的、重要的、有实质性的。而新加坡人认为这是不够的，还需要法律的约束，但华人认为这是妨碍他们的自由，是对他们的不信任。再如华人的时间观念也有别于新加坡人的时间观念。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经济往来活动。相反，新加坡人很愿意同华人打交道，他们认为同华人往来有一种舒适感，易于操作。反之，华人也有此认同感。文化价值观、历史传统与他们各自经济事业的成功并无关系。

此外，有些学者还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即中华文化、历史传统与华商事业成功有关系，但不大。

3. 如何看待海外华人与当地社会融合的问题。

从中国海外移民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华侨转变为华人是60年代的事情。这以前，绝大多数华侨的观念是“落叶归根”，与当地社会的融合并未形成一种趋势。60年代，由于形势的变化，华侨转变为华人以后，其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即由“落叶归根”转为“落叶生根”，华人与当地社会融合成为必然，并逐步形成一种趋势。有些学者以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为例，说明在这种逐步形成的趋势中，海外华人已与当地社会融合得非常好。有些学者则指出，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说华人与当地社会融合得非常好，为什么他们还在不断地寻求当地的政治庇护（即使是在融合得比较好的国家里）？特别是华商在东南亚国家寻求政治庇护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指出：华商寻求政治庇护是为了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保证其资本的有效性，不涉及到融合问题。因为即使是当地土著商人，他们也要寻求来自政府的庇护，以确保他们的利益。

毋庸置疑，海外华人求生存、求发展的目标，必然使其与当地融合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但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代表们除了对上述问题阐述了不同的观点外，还对华人经济

研究中涉及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有人希望最好能有一个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理论来指导华人经济的研究。有人认为这不可能，也不必要，因为理论是你的仆人，而不是你的主人。值得我们研究的是各种各样的区别，以及产生区别的原因。

最后，来自各国和各地区的学者，呼吁加强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进一步促进有关全球华人经济、华人商贸联系等问题的研究。

华人经济、华商企业等问题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民族、宗教等多学科和理论，获取准确的华人经济发展的有关统计资料有一定困难，基础经验研究比较薄弱等，这些无疑加大了今后深入、系统地研究华人经济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另外，当今全球华人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一支不容忽视的有生力量。因此，今后广泛、不断深入地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加强研究力度是极其必要和重要的。那么如何进一步促进今后的研究工作呢？与会学者指出，要不断加强交流、合作和基础经验的研究，同时还提出了今后需要研究的一些课题，主要有：（1）如何认识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制度下华人经济事业发展模式的不同；（2）如何认识、评价全球华人间的合作与冲突；（3）如何看待东南亚华人资本外流现象，特别是向中国的流动；（4）东南亚华人资本的流动对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到底产生多大影响；（5）如何进一步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出发，更具现实意义地对全球华商企业和西方企业（特别是东、西方家族企业）进行准确的比较研究；（6）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海外华人经济事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通过这次友好、热烈的讨论，不仅促进了学术交流，增进了了解，可以说还在海内外学者间建立了一个开放的、积极开展的学术交流网络，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如北欧亚洲研究所所长汤米·斯文森先生在总结会上所说的那样，这次会议虽然结束了，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学术交流活动随之结束，

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了一次很好的对话。同时他还表示，为了进一步促进今后的研究，他们愿意对好的课题、好的项目提供基金，并愿意与有关的基金会进行联络。

东南亚华人网络—— 过去、现在与未来

—丘立本—

战后东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华人在经济上的成就，引起学术界对华人企业及其网络的浓厚兴趣。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东南亚现代华人网络的演变，希望能对它有一个更符合实际的认识。

华人网络历史

经济网络与商品经济有着密切联系。历史上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和民族，如古代的地中海地区和那里的腓尼基人、希腊人，中世纪欧洲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古代和中世纪东方的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等，都曾建立过自己的商业网络。资本主义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网络日趋普遍。英、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从19世纪初起，逐渐将他们的经济网络扩展到全球各地，海外华人网络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由中国移民在中国境外建立起来的。

中国人移居国外的历史虽然很长，但大规模迁移海外却是发生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据不完全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一百年里，中国人出国人数将近一千万，足迹遍及五大洲数十个国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内部的天灾人祸有直接关系，也与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扩

张密切相关。1840 年的鸦片战争和西方列强的入侵，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导致大量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破产。1848 年以后美洲、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美国、加拿大横贯美洲大陆铁路的修筑，以及东南亚各国沦为殖民地后资源的开发，处处需要大量劳动力，西欧各国便迫使清朝政府在与之签订的《北京条约》、《中荷通商条约》和《蒲安臣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准许他们来华招募廉价劳工，遂使中国人口大量外流。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移民大规模出国的同一时期，欧洲有近六千万移民涌向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印度约有三千万移民被迁移至南亚、东南亚和南非一带。由此可见，中国人口的大规模外迁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现象。中国移民是世界移民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劳动力在国际劳动市场中的流动，与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密切相关^①。

由于中国的经济落后和政府腐败，被资本主义洪流卷到世界各地的中国移民，完全得不到中国政府的帮助，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组织自助团体，和衷共济，团结自救。19 世纪的中国还是个封建宗法社会，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核心，刚刚离开土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自然带着这种社会关系和传统的观念，依照他们所熟悉的社会组织模式在移居地建立自己的新团体。中国移民的绝大多数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那里方言众多，彼此难以沟通，因此移民来到各移居地后便形成了以方言为基础的群体，即所谓的帮，并在帮内建立了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同乡会（会馆）和宗亲会组织。东南亚华人中主要的帮有广东帮、潮州帮、福建帮、客家帮和海南帮等。最早出现的地缘组织有马六甲的应和会馆（1820 年），新加坡的宁阳会馆（1822 年）和福建会馆

^① 游仲勋：《东南亚之华侨》，亚洲经济研究所，1983 年版，第 11～15 页；参看丘立本：“从世界史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问题刍议”，《世界历史》，北京世界历史研究所，1986 年第 3 期。

(1860年)等,最早的一批宗亲会组织则有新加坡的曹家馆(1819年)、四邑陈氏会馆(1848年)、福建林氏宗祠(1857年)、菲律宾的龙岗公所(1884年)等。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宗乡组织在海外华人中已十分普遍,仅新加坡一地就有姓氏宗亲组织60个,同乡会组织64个,这些宗乡组织成了早期华人经济网络的基础^①。

这些宗乡组织,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族色彩,怎么能成为华人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网络的基础呢?这是因为,和国内的情况不同,这些组织是由被卷入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中国移民,为了在国际竞争中求生存而建立的,其主要成分是脱离了封建土地关系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他们虽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但国际移民的地位和小生产者的自发势力往往使他们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去寻求自身的出路。因此,这些组织在国外建立时,其性质和功能便开始发生变化。例如,国内的宗亲组织是以五服内的世系群为核心建立的,但在海外,移民多为单身汉,不能建立真正血缘的组织,只能建立单姓或数姓联宗的宗亲组织,如包括了十八姓的龙岗亲义总会。海外各方言群人数多寡不一,不少同乡会组织的“乡”包括了数县乃至数省,如“三江会馆”包括江苏、浙江和江西三省。可见海外的宗乡组织是移民为了互助自救的实际需要而建立的,实际上是没有多少血缘关系的血缘组织,是失去土地、离开故土的地缘组织。又如国内的宗乡组织多为豪强地主所把持,成为地方割据的工具。海外的宗乡组织则与地主无缘,其任务是帮助“新客”,解决食宿、工作、贫病、安葬、祭祀等困难,举办其他社会公益事业,调解内部纠纷等。再如封建制度下商业资本的出路,一是购地,二是做官,因此会馆多变为“仕商

^① 钟临杰:“对新加坡人会馆的功能改变的反思”,《亚洲文化》第14期,新加坡,1990年,第61页;参见钟临杰:《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变迁》,新加坡大学出版社,1986年。